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六十五期 2006年11月 頁183~221 臺灣大學文學院

# 光復初期(1945-50)的民族情感與省籍衝突——從臺灣大學的接收改制做觀察

# 李 東 華\*

### 摘 要

本文透過光復初期負臺灣大學實際責任的歷任外省籍校長與臺籍重要 成員之間的任事與交往,探索在民族情感與省籍衝突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前者包括羅宗洛、陸志鴻、莊長恭與傅斯年四任校長,後者則為杜聰明(長 期任醫學院院長)與林茂生(任先修班主任並實際處理文學院院務)二人。

論述以人物交往為經,以發生之重要事件為緯,詳列史料以陳明事實,期望能呈現此一關鍵時期高級知識分子間往來之實況,進而檢討出現齟齬並釀成二二八悲劇的主因。

研究發現,光復初期臺籍知識分子民族情感空前澎湃,反映在臺大校園的是通力合作完成接收工作。但隨即出現歧見,從民國三十五年三月的臺大醫院罷診事件到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變,無不反映雙方猜疑的深重、互信的缺乏。深入檢討其原因,出於分袂弟兄文化差異者少,而出於人謀不臧、個人性品者多。至於二二八事變形成的校園悲劇,則與政治勢力刻意介入校園,學術領導人又未能妥善堅持學術之獨立與自主有以致之。

關鍵詞:民族情感 羅宗洛 杜聰明 陸志鴻 林茂生 莊長恭 傅斯年

<sup>95.06.19</sup>收稿,95.10.24通過刊登。

<sup>\*</sup>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個人近年來,因從事臺大校史的研究,對於光復之初臺大轉折時期的歷史(1945-50),有所涉獵。作爲彼時臺灣最高學府的臺大,在接收、改制的過程中,足以反映經過日本殖民統治半世紀之後,中國文化重臨臺灣時,文化差異下的互動與衝突現象,實爲彼時臺灣政治、社會發展的一個側面。過去研究光復初期史之學者,多以中國政治腐敗、經濟凋弊,以及中、日文化衝突,作爲解釋其時社會動盪的主因。「本文則嘗試從臺大接收、改制之過程中,臺籍、外省籍主要學者的共事交往,來觀察彼時臺灣社會出現之省籍衝突。企望透過高水準知識分子間的互動,探索形成此一惡狀的原因。校園中知識分子間的往來,能否全以省籍衝突名之,作者並無把握,姑暫依前人用語稱之。

本文論及的人物,主要以來臺接收、負主要責任的校長,如羅宗洛、陸志鴻、莊長恭及傅斯年等四位外省籍學者,與協力接收改制之臺籍學者,如杜聰明及林茂生,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論及的事件,則以一九四六年三月發生的「臺大醫院罷診事件」、「二二八事變」及莊長恭迅即去職等事件,並交互論述人物與事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 二、主要人物簡介

杜聰明(1893-1986),臺灣臺北淡水北新莊人,茶農之子。一九〇一年九歲時隨長兄習漢文,一九〇三年入滬尾公學校(六年制),開始接受日式教育。一九〇九年公學校畢業,以第一名考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五年制),一九一四年畢業,畢業後無意行醫,入總督府研究所爲雇員,學習研究工作。一九一五年赴日,入京都帝國大學從賀屋隆吉教授研究內科學。一九一六年轉從森島庫太教授研究藥物學。一九二〇年十月應聘爲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講師,但仍以在外研究員身份留京都研究;翌年秋升任助教授,並兼任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主持實驗治療學研究室,年底獲京都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一九二二年四月,任助教授甫半年,晉任教授職。一九三六年,臺北帝大增設醫學部,

<sup>1</sup> 如:李筱峰,〈二二八事件前的文化衝突〉,《思與言》29:4(1991)及陳君愷, 〈同文化與異文化的交會點——「光復」與臺灣醫生患者間醫療關係的一個轉折〉, 《臺灣風物》49:1(1999)等文。本文正文行文,光復以前用西曆紀年,光復以後 以民國紀年。

杜聰明獲聘擔任醫學部藥理學講座教授,迄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爲帝大唯一 之臺灣籍教授。<sup>2</sup>

林茂生(1887-1947),臺灣臺南人,出身儒學及基督教家庭。幼承家學,能文能詩。一八九八年開始習日文,一九〇四年就讀長老教中學,又習英文。一九〇八年赴日,入京都同志社中學爲四年級生,一九一一年考入第三高等學校。一九一三年三高畢業,升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主修東洋哲學。一九一六年,獲東京帝大文學士學位,爲臺灣籍獲日本文學士之第一人。隨即返臺,任教母校長老教中學。一九二〇年轉任府立臺南商業專門學校教授,仍在母校兼課,擔任英文科之教學。一九二七年,林以四十之齡,以總督府在外研究員公費赴美留學,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攻讀,一九二九年底獲博士學位,論文題爲:"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Problems"(「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公立教育:一個發展與文化問題的歷史與分析研究」)。爲臺人獲文科博士學位之第一人。一九三〇年返臺,次年轉任府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任英、德文科主任兼圖書課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升勅任官,隨即退官,轉任臺南工專、臺南師範囑託,以迄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止。3

羅宗洛(1898-1978),浙江黃巖人。一九一七年上海南洋中學畢業,旋即赴日留學,次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理組,一年期滿後,升讀仙台第二高等學校本科。一九二二年四月升入北海道帝大農學部植物學科,追隨坂村徹教授研究植物生理學,一九二五年本科畢業,再入大學院深造。一九三〇年獲博士學位。隨即返國,先後任教廣州中山大學(二年)、上海暨南大學(一年)、南京中央大學(七年)、浙江大學(四年)。一九四四年轉任中央研究院新成立之植物研究所所長職,以迄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

民國卅四年九月中,羅氏奉教育部長兼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令以特派員身分來臺接收臺灣大學,十月九日自重慶出發,十七日抵臺。原定羅氏完成臺大接收工作後,即卸職回任中央研究院原職,由內定校長陳大齊接任校長,但陳氏因故辭任,羅氏只得續任首任臺大校長(稱代理校長)工作,至三十五年五月離臺,七月正式卸任止,在臺大任職歷時十月。三十七年四月羅氏當選首

<sup>2</sup> 有關杜聰明之研究甚夥,晚近有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文化書坊,2002)一書。其長女杜淑純,《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5)一書亦已出版。

<sup>3</sup> 有關林茂生之研究甚夥,可參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臺北:玉山社,1996)一書。詳歷見〈林茂生〉,《臺灣人士鑑》(臺南:與南新聞社,1943)。

屆中央研究院院士。4

陸志鴻(1897-1973),浙江嘉興人。一九一五年秀州中學畢業後赴日留學,入東京一高預科及本科,一九二〇年依例升讀東京帝大,入礦冶科就讀。一九二三年畢業,在三井公司三池煤礦服務一年後返國,任教於南京工業專門學校。一九二七年南京工專併入國立中央大學,轉任土木系教授,教授工程材料、材料力學及金相學等課程,前後二十餘年。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隨羅宗洛先生來臺,協助接收臺北帝大,負責工學院之接收,並任首任工學院院長。次年八月,獲教育部聘爲臺大第二任校長。任職至三十七年五月底。5

莊長恭(1894-1962),福建晉江人。一九一八年肄業於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次年以清華津貼生身分赴美留學,入芝加哥大學研習化學,一九二四年獲博士學位。返國後,先後任武昌大學、東北大學等校教授。一九三一年赴德進修二年,在哥廷根及慕尼黑大學研究。一九三三年返國,任南京中央大學理學院院長,之後主持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1934-1939)。抗戰勝利後任北平研究院藥學研究所所長。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當選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五月奉命接替陸志鴻,擔任臺大第三任校長,惟僅在職半年(1948.6-1949.1)。6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幼讀小學堂,一九一〇年入天津府立中學堂,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九一六年卒業,繼入北大國文系,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爲學生運動領袖,同年夏畢業。旋考取山東官費,赴歐留學,在英、德計七年。一九二六年冬返國,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中文、歷史系主任。一九二八年春,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爲終身所長。抗戰勝利後,任北大代理校長,完成北大遷校工作。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十八年初臨危受命接任臺大校長,翌年十二月二十日以腦溢

<sup>4</sup> 有關羅宗洛,黃宗甄有《羅宗洛》(科學巨匠叢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一書。另有羅氏《羅宗洛回憶錄》(上海: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學研究所,2003, 以下簡稱《回憶錄》)及附錄〈接收臺灣大學日記〉等珍貴史料。拙著,〈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1945-50)——羅宗洛接收時期〉,《結網二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頁455-493一文,亦可參看。

<sup>5</sup> 有關陸氏生平,謝承裕,〈陸志鴻先生傳記〉(1993)及周廣周,〈當代師表陸志鴻教授〉(《中國一週》336 期,1956)兩文可參看。拙著,〈論陸志鴻校長治學風格與臺大文學院(1946.8-1948.5)〉,《臺大歷史學報》36 期(2005),頁 267-315,亦可參看。

<sup>6</sup> 有關莊氏生平,資料不多,可參《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錄》第1輯(臺北:中央研究院,1949)。《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臺北:臺灣大學,2005),頁 448-450,亦可參看。

血猝浙於省參議會場,在職七百天。<sup>7</sup>

茲將六人共事關係,表列如下:

校長	羅宗洛		陸志鴻	莊長恭	傅斯年
任期	1945.11.15-1946.7	19	946.8-1948.5	1948.6-1949.1	1949.2-1950.12.20
醫學院院長 杜聰明			嚴智鍾	杜聰明	
任期	1945.11.15-1947.3		1947.4-6	1948.7—→1953.7	
校務委員 先修班主任					
代理文學院院務 林茂生					
任期	1945.11.15-1947.3				

## 三、光復初期民族情感之澎湃: 以羅宗洛接收時期為例

光復伊始,本、外省人情感甚佳。此可由來臺接收之羅宗洛校長所遺留之〈接收臺灣大學日記〉看出端倪。羅氏乘美軍艦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在 基降登岸。羅氏是日日記云:

基隆同胞出迎者甚眾,吾人被導至郵政局大廈中休息。當地人士以 茶點招待,女學生殷勤進茶,各面有喜色。男女學生皆能操流暢之 日語,態度大方而有禮貌。余等久不食香蕉,爭先取啖,轉瞬乃罄。 三時半,整隊赴車站,招待者以香蕉、文旦見贈,情意殷勤。余等 入一等車廂,女生又進茶果。……六時許抵臺北。沿途各站皆有臺 胞佇立歡迎,車過時歡呼揮手,狀極愉快。……(臺北)驛前燈火 輝煌,同胞以萬計夾道歡呼,情形之熱烈,為余平生所僅見,足見 臺胞民族意識之盛旺。8

<sup>7</sup> 有關傳斯年之研究,汗牛充棟,難以計數。生平學術可參看,Wang, Fan-san (王汎森),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0)一書。拙著,〈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孟真先生在臺大),《臺大歷史學報》20 期(1996),頁 129-163,專論傳主在臺大之行事作為,以公開發行之文獻為重要材料,仍須增補。

<sup>8</sup>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以下簡稱〈日記〉),為羅氏《回憶錄》附錄, 十月十七日則。

這是一般臺灣同胞的現象。其次,羅氏到臺北車站,「下車後,遇林忠君,介紹杜聰明教授,杜教授爲臺北帝大之唯一臺人教授,專攻藥理學,年約五十,能操簡單之國語,一見如故」,<sup>9</sup>其後羅氏立即增聘杜氏加入接收團隊爲委員。<sup>10</sup>數日後,羅宗洛氏聽聞林茂生先生爲臺灣文科人望,先後獲有東京帝大文學士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亦不待與林氏見面溝通,即決定再加聘林氏爲接收委員,<sup>11</sup>並負責文政學部的接收工作。<sup>12</sup>之後,羅氏又拔擢原帝大豫科書記陳英湛先生爲總務主任,協助接收工作。<sup>13</sup>

除開三位重要接收幹部外,接收期間因事物繁多,時間又緊迫,因此任職 臺大之臺籍教職員均全力投入接收工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sup>14</sup>云:

<sup>9 〈</sup>日記〉,十月十七日。《回憶錄》則云:「在車站上,歡迎群眾中有人(長官公署的先遣人員)引杜聰明來接我。杜聰明,臺灣名人、醫學博士、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在日本統治臺灣時代,他是大學教授中唯一臺灣人,我在到臺灣之前,已聞其名。杜向我們表示熱烈的歡迎,並說明自己是一個愛國者,在日本留學時,即已加入同盟會,杜把我們四人引至臺大校長住宅安置下來。一連數日,杜詳細地向我們介紹了大學情況。鑒於我們五個接收人員中沒有學醫的,而臺大醫學院在臺大中歷史最久,規模最大,接收時應依靠杜聰明,故即請他加入我們的接收隊伍」,頁29。羅氏《回憶錄》撰於文化大革命被監禁期間(1969.7.14寫畢),且係「交代」材料。

<sup>10 〈</sup>日記〉,十月十九日則:……(中午)王泳(按:接收委員會秘書)君至前進指揮所拍電報一通與教育部,報告臺灣情形,並請加聘杜聰明君為接收委員。見《回憶錄》,頁32。

<sup>11 〈</sup>日記〉,十月卅一日載:羅氏約陸志鴻、馬廷英(按:皆接收委員)及杜聰明聯 被至北投訪林茂生氏於沂水園,適林氏赴臺北未得見。十一月二日,林氏回訪羅氏, 雙方初次晤面,而同日上午九時半,羅氏已得陳儀長官批准趙迺傳、范壽康(按: 長官公署前後二任教育處長)、羅宗洛、陸志鴻、馬廷英、杜聰明及林茂生七人為 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委員。見《回憶錄》,頁37。

<sup>12 《</sup>回憶錄》云:「不久,浙大的蘇步青、陳建功、蔡邦華三人也趕到。這樣理、農、工、醫四學院的接收已有人負責,唯文、法二學院缺人。探聽得在臺灣同胞中有林茂生者,是留學日本專攻教育學的文學士,且曾到美國鍍金,在臺灣人中頗有名望,特請其負接收文法學院之責,他愉快的接受。」(載同註9)

<sup>13</sup> 陳英湛氏,大正十二年(1923)臺灣總督府普通考試及格,昭和十八年至十九年(1943-1944)任工學部書記、會計係長,光復時任豫科書記,似為帝大臺籍職員中職位最高者。

<sup>14</sup> 此報告書係打字本,未署年月,且久經複印,漫漶不清處頗多。報告書係由羅宗洛 以第一人稱口吻親撰,查其〈日記〉,知撰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一月十五日至 廿六日,廿六日〈日記〉記載:「接收報告已脫稿」。

大學範圍廣汎、物品眾多,為求點收迅速及嚴密起見,乃動員本省人之服務於大學者約七十餘人,參加點收工作。此七十餘人者,服務於大學之各部分,內部情形極其熟悉,且生活飽受日人之壓迫,民族意識非常強烈,甚願為國家效勞。點收方法,先據移交清冊一一清點,然後取「臺帳」對照,「臺帳」所有,而移交清冊中所無者,必追究其遺漏之原因,如是查出移交清冊中所不載之物品甚多。15

從臺大校園的接收工作來看,當時本、外省人上下一心,共謀臺北帝大完整接收之情形,躍然紙上。民族情感之深厚,可以概見。羅氏於接收後大量聘用原帝大臺籍教師,並銳意進行本省人才之調查,按其學力、資歷予以拔擢,計新聘臺籍之教職員一百三十四名,其中聘爲教授、副教授者有二十八名,較之帝大時僅有臺籍教授一名、助教授三名(其中二名爲醫專助教授),有甚大之改變。<sup>16</sup>顯然,臺大之接收爲中央派員與大學臺籍人員共同努力之結果。雙方民族情感之自然流露與知識分子高瞻遠矚之作爲,實有以致之。

但自接收時期始,以羅宗洛爲首之接收負責人與臺籍師生間已有歧見,其中尤以對校內日籍教職員生態度之不同,最爲明顯。臺灣被日人統治五十年,飽受日人壓迫,光復初期全島反日氣氛之濃烈,遠非今日可以想像。臺大臺籍師生欲將日人勢力「一掃而光」。此氣氛自羅氏十月十七日抵臺初次會見杜聰明氏時,即聞杜氏云:

日人皆願留,唯不欲出之口,而臺胞學生則不願再受日人之教,欲 乘此機會將日人在臺勢力一掃而光。如人才不足時,寧延聘歐美學 者,再不然亦不惜暫時停頓,甚至降低程度。

羅氏認爲如此作法,「決非臺北大學之福」,請杜氏勸導學生「不可以一時之

<sup>15</sup> 在醫學院接收中負責第一附屬醫院接收工作的翁廷俊教授也回憶說:「當時各科主任和職員都非常認真負責執行工作,日人要盜出去的東西也紛紛被追查回來。比方說,第一附屬醫院只有一位牙醫師林宗生、牙技工二人。由技工處得知齒科很多儀器去向不明,乃找日人醫局長技松牙醫師來問,起初他還不肯承認,後來知道抵賴不過,才答應交還清冊,結果接收了十餘竹籠儀器和近十兩黃金還給院方。又,第二附屬醫院的同仁從天花板查出一大批麻醉藥品歸還院方。大家都為了能脫離被統治的身份而喜悅,那種上下一心的感受,充滿每個人的心田。」見〈盤古開天〉,《楓城四十年》(臺北:臺大醫學院,1985),頁50。

<sup>16</sup> 光復初期臺大人事記錄有出入者甚多。此處根據《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三、接收後之處置:(三)本省人員之登用一節記載。

情感,誤百年之大計」。<sup>17</sup>十一月五日,杜聰明氏率員接收帝大醫學部及其附屬機構,醫學院及醫專臺籍學生竟於接收後,自行舉行「解放式」,命令日籍學生從此不要來校上課。羅氏由理、工學院學生口中得知此事,當即表示「允許日人繼續上課爲本省之政策,學生取直接行動,干涉行政,破壞紀律,不能贊成」。<sup>18</sup>杜聰明對羅氏說:「醫學部學生堅持肅清日籍學生,不肯讓步」。羅氏感嘆云:「接收伊始,學生已如此囂張,殊屬不成體統」。<sup>19</sup>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二時,羅氏召集臺籍教職員訓話,請彼等協助接收,並維持秩序。醫學部職員亦支持學生,與馬廷英氏爭辯良久,最後雖同意羅氏等之意見,<sup>20</sup>但二十一日,杜聰明向羅氏報告謂「醫學部學生仍不聽訓誨,阻止日人上課」,羅氏「決採嚴懲態度」對付。<sup>21</sup>次日,前帝大總長安藤一雄氏來向羅氏控訴此事,言「醫學部學生不准日生上課,杜聰明似無力制止」,彼「欲以前總長資格向長官(按:指陳儀)有所請求」,經羅氏告以「余等之決意」,安藤始辭出。<sup>22</sup>至此,醫學部學生始遵令不再阻止日生上課,至十一月底此事始完全平息。<sup>23</sup>

對接收委員留用日籍教授之決策,如前所述,臺籍師生亦多反對。先是十月二十六日全省接收後,在醫學院服務之臺籍學者六、七人至羅宗洛寓,表示無需留用日籍教授,其理由爲:(1)目下在職之日籍教授著名者不多,而臺灣醫學者優秀者甚多,可取而代之。(2)日籍教授向來壓迫臺灣人,不使抬頭,留之亦未必肯熱心指導。羅氏雖體念其感受,認「其言亦有若干理由」,<sup>24</sup>但羅氏不欲因接收而降低學校之教學水準爲既定之目標,且爲使事務不至停頓,留用日人爲不可避免之事,因此堅持留用部分日籍教師。接收期間受杜聰明院長委派負責接收第一附屬醫院的翁廷俊(另一位是邱仕榮)教授回憶說:

六人小組會議本來無意留用日籍教授。但是,來臺接收臺北帝大的 三位特派員表示,教授是無價之實,如同戰利品一般,應該予以留 用。於是六人小組決定,除了一名平常最看不起臺灣人的病理科武

<sup>17 〈</sup>日記〉,十月十七日則。

<sup>18 〈</sup>日記〉,十一月十五日則。

<sup>19 〈</sup>日記〉,十一月十六日則。

<sup>20 〈</sup>日記〉,十一月十七日則。

<sup>21 〈</sup>日記〉,十一月廿一日則。

<sup>22 〈</sup>日記〉,十一月廿二日則。

<sup>23 〈</sup>日記〉,十一月廿六日則,仍有安藤總長偕前醫學部長森於蒐來向羅氏報告醫學 部臺、日籍學生不合之事。

<sup>24 〈</sup>日記〉,十月廿六日則。

藤教授外,凡是願意留下來的日本教授,均繼續聘用。25

在得到臺籍師生諒解下,國立臺灣大學留用日籍教授接近九十名。<sup>26</sup>總結此事,羅氏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中說:

臺灣人向受日人之欺侮,恨之刺骨,光復伊始以為可將日人一舉自臺灣驅逐。聞政府有留用日人之意,大不以為然,前來陳述意見者,日有其人。經告以接收過渡期間,為使事務不至停頓起見,留用日人為不可免避之事,何況飽學之士,世界之實,應不分國籍盡量利用,諄諄勸誘至再、至三,最後本省青年學生始諒解斯意,不再反對。27

對日人態度之歧異,由臺籍人士立場觀之,實反映彼時臺籍同胞民族情感之熾烈。由外省特派員立場觀之,彼時八年抗戰方終,抗戰期間三人皆曾顛沛流離於西南各省,對日人絕無可能有好感,但彼等能從「百年大計」之學術教育做考量,實有過人之度量,只是由今視昔,徒感慨此決策未能妥善延續也。

# 四、衝突例一:臺大醫院罷診事件(民35.3.22-4.11)

民族情感空前蓬勃的蜜月期很快過去,面對接收後的實際問題,雙方因立場與經驗之不同,逐漸產生異見。除前文提及對日籍學生及教師之態度外,接收後學制的更改,彼此間歧見亦多。羅宗洛等認爲不能因接收而降低臺大之水準,故主張盡可能維持原有之制度,高等學校固因中國無此制必須廢棄,但臺大之預科不能輕言廢止。杜聰明則先主張廢預科,將學生併入高中。<sup>28</sup>之後力主廢臺大附屬醫專,將學生併入預科(低年級生)及醫學院本科(高年級生),<sup>29</sup>此議爲羅宗洛氏接受。臺大既廢醫專,將學生直接併入大學,另三

<sup>25</sup> 見〈盤古開天〉,《楓城四十年》,頁49。「六人小組」係接收時期「臺醫同學會」 (醫學部在職臺灣人醫師組織)選出協助醫學部接收工作之五名委員,即李鎮源、 許輝煌、許強、賴肇東,及翁廷俊五人,連同杜聰明院長,為接收時期醫學院決策 中心。三位特派員指羅宗洛、陸志鴻及馬廷英三人。

<sup>26</sup> 參《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三、接收後之處置:(1)教職員:(一)日籍教員 之甄審」,計留用日籍教授89名,如加上助教授等各級教師,遠過此數。

<sup>27</sup> 見同前註。

<sup>28 〈</sup>日記〉,十月十九日則。

<sup>29</sup> 十月二十九日羅宗洛與杜聰明擬妥說帖,對臺大附屬醫院、醫專、赤十字會醫院、 熱帶醫學研究所等有所主張,次日馬廷英與杜聰明晉見陳儀長官說明其主張,得陳

所高等專門學校——臺北商專、臺中農專及臺南工專,亦隨之改制爲省立法商學院、臺中農學院及臺南工學院,此項改制利弊如何,今日應有公評。

在臺大接收改制中,雙方正協商改進,竟發生臺大附屬醫院罷診一事,實爲此一時期中最不幸之事件。此事原委如下。臺北帝大醫學部與附屬醫專,有一特殊制度,即附屬醫院除編制內醫師(稱有給醫師)外,尚有留用無給助理醫師在醫院服務之慣例。早年臺籍醫師留院擔任無給醫師兩年後,往往會因後輩之日籍醫師先升爲編制內有給醫師而被氣走,故附屬醫院臺籍醫師不多。至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大量徵召日籍醫師赴戰場爲軍醫,始有較多臺籍醫師升任有給之副手、助手及講師等級職。光復初期,這些職位大部分爲臺籍醫師所佔有。30接收後,羅氏將此輩教職合共九十三名(計醫學院十八名,第一附屬醫院五十六名,第二附屬醫院十七名,熱帶醫學研究所二名)先予聘任。31當時任無給職助理醫師者,希望能補日人離去後餘下之有給職務,無給者亦要求學校能發委任狀(即聘書),遂引發成爲罷診事件,此爲事件之背景。

羅宗洛等在接收臺大後,因省公署干涉臺大人事未遂,謀自辦文、法學院對付臺大,<sup>32</sup>因而與省方交惡。又因經費無著,<sup>33</sup>羅氏欲回重慶向教育部有所請示。<sup>34</sup>卅五年二月九日,羅氏搭機離臺赴滬。據杜聰明氏說法,行前在機場,已得羅代校長之許可,在其述職請假期中,可發委任狀,請彼早日向代理職務者提出名單。二月下旬,杜聰明向校方提出助理醫師名單七十名,其中三十名,請由無給改爲有給職,並請求補發委任狀。<sup>35</sup>代理校長職務之陳建功(教務長)

長官同意,附屬醫院、赤十字會醫院及熱帶醫學研究所皆歸大學,醫專即取消。見 〈日記〉,十月廿九、三十日則。

<sup>30</sup> 詳見翁廷俊教授之回憶。見〈盤古開天〉,頁49。

<sup>31</sup> 詳見《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三、接收後之處置:(1)教職員:(三)本省人材之登用」節。

<sup>32</sup> 詳參抽作,〈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1945-50)——羅宗洛接收時期〉,三、羅宗 洛在臺大與長官公署的交涉,頁468-481。

<sup>33</sup> 臺大為國立大學,經費應由中央政府開支,但光復初期,臺灣行特殊財務貨幣制度, 法幣在臺灣無法流通,中央希望臺省能支應臺大之經費,但陳儀始終不同意。民國 三十五年三月,接收自帝大之經費行將告罄,羅氏屢向省方交涉,皆不得要領。

<sup>34</sup> 見〈日記〉,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則。臺大一級主管決定請羅代校長返渝交涉。

<sup>35</sup> 該事件發生之初,各報少有報導,至三月廿二日第一附屬醫院罷診後,報導漸多。 初期經過,見《臺灣新生報》,三月廿六日,日文版,〈辭令發給校長も承諾濟み 一罷診まご經緯〉,4版。《人民導報》,三月廿二日,日文版。《民報》,三月廿 二日,中文版,2版頭條亦可參看。

氏, 36以名額眾多, 未便草率從事, 請留待羅代校長沭職返校後再做決定, 遂 至引發風潮。名單中之當事人於三月十九日中午推派代表前往校長室陳情,由 周頌久(昌壽) 主任秘書接見,主秘態度強硬,且出語不遜,<sup>37</sup>引起與會代表 強烈不滿。返回醫學院後群情激憤,即以「職員一同」名義草擬「要求書」, 限學校於廿一日下午五時以前:(1)編制內原額補足;(2)編制外無給職者發出委 任狀,否則「大學當局,應負一切責任」。屆期未得校方回覆,第一附屬醫院 醫師宣佈自廿二日起停診外來患者(住院病人仍予照顧),廿五日第二附屬醫 院繼之響應。廿六日,杜聰明院長召集兩附屬醫院職員協商,提出二條件:(1) 廿八日下午五時以前,發聘書,有給職者聘期自二月一日起,無給職者追溯自 去年十二月一日。(2)改正校務當局的官僚態度。對此,大學本部提出「不接受 任何附帶條件,應立即無條件復診」,談判破裂。<sup>38</sup>「改正校務當局的官僚熊 度」之新訴求,將怠診事件之責任推至大學當局,甚者謂「其責任應由周主任 秘書負之」之言。39卅日,臺北市參議會開緊急會議,要求游禰堅市長居中排 解,並轉呈陳儀長官促其迅予圓滿解決。在游市長協調下,陳代校長表示該校 以往所發之聘書及委任狀,均係暫時性質,現羅校長已領到正式關防,校方已 通知各單位造冊候核,故須待校長歸校後,始能辦理委任事官。40同時臺大醫 學院基礎學教室及全體學生亦於四月一日分別發表決議書及聲明書,聲援醫院 同仁。<sup>41</sup>四月九日,羅代校長自滬返臺,在機場向記者表示,對醫院怠診風潮, 當徵詢各方意見,可望於一、二日解決。42次日下午三時,杜聰明率醫院代表

<sup>36</sup> 陳建功,浙江紹興人,日本東京高工、東北帝大數學科畢業。一九二九年獲東北帝 大數學博士學位,為國人獲日本理學博士之第一人。返國後任教浙江大學,其後又 延攬一九三一年獲東北帝大數學博士的蘇步青至浙大任教,在數學界有「陳蘇學派」 之稱。陳氏與羅宗洛友善,應邀來臺接收臺大,接收後任教務長。

<sup>37</sup> 報載引述出席者說法,周頌久說:「祖國無此制度」(指無給助理醫師)、「羅校長對此事並無任何指示」、「因為預算尚無著落,尚無法補足編制內職員」、「校長不在,委任狀不能發」、「無聘書的人,不是臺大職員,故無權作要求」等語。見同前數報。

<sup>38 《</sup>臺灣新生報》,三月廿七日,4版,〈杜院長の斡旋も空し罷診事件ますく紛糾〉。

<sup>39 《</sup>民報》,三月廿六日,2版,〈第二病院亦罷業,臺大風潮不能解決〉。

<sup>40</sup> 事件中陳建功代理校長僅發表過一次公開聲明,載《臺灣新生報》,四月四日,3 版,及《民報》,四月四日,2版。

<sup>41</sup> 参《民報》,四月二日,2版,〈醫大學生開大會,要求大學當局反省〉及〈基礎學教室職員亦提出決議書〉兩則。

<sup>42 《</sup>臺灣新生報》、《人民導報》,四月十日,引中央社九日訊。

會見羅代校長,羅氏表示: (1)無給職委任狀十一日即發。(2)編制內有給聘書暫時保留,待行政院通過臺大預算後,將在預算許可最大限度補充缺額。(3)對於大學民主化之要求極爲贊同;自己絕非官僚之人,大學將儘量制度化。代表們返醫學院後,隨即於六時召開全體醫員會議,決定自次日(十一日)起開始復診,<sup>43</sup>事件落幕。

臺大醫院罷診事件,看似小事,其實不然。當時即有人視其爲「臺灣光復後第一次的不祥事件」、「是臺灣最高智識分子第一次的風潮」,<sup>44</sup>如果我們了解前述臺大接收過程中,臺籍、外省籍知識分子間合作無間的情形,此一事件理應不會發生。但它卻發生了,原因何在?或可由當時主要報紙的評論窺見端倪。三月廿六日,在杜聰明偕醫院代表提出速發聘書,改正校務當局的官僚態度要求後,《民報》首先發表〈論大學醫院的風潮〉社論,<sup>45</sup>針對罷診者兩項訴求:保障身分及大學民主化評論說:

保障身份,這不但是大學醫院一部分服務員的要求,而且是全省本省公務員普遍的希望。……所謂保障身份有幾個步驟,第一要依其學歷經歷工作能力而予以適當明確之地位,第二其地位須使其有相當程度的安定。請問現在各機關的本省人服務人員,有沒有得到這個地步?我們所知道的,有許多人材,雖然已經錄用,然其所受的地位待遇,則不能其所,而且兩月一換,三月一調,致有「三月官二月滿」的新語出現,這樣那裏能夠為公埋頭苦幹?

「民主化」不僅是附屬醫院的要求,而又是全省民眾的要求,全國國民的要求。……官僚的威風掩蓋了一切,芝麻綠豆的官員,也有一副臭架子,向上則巴結表功,對下則欺矇威脅、耍花樣、玩權謀,所表現的是貪污庸碌。這種封建官僚的作風,我們再不能容許其繼續下去,所以不但大學應當民主化,我們要求的是整個國家的民主化。

申論之,這次大學醫院的風潮,不但是大學醫院的問題,在其本質 上,與其他機關都有一聯的相關問題。

<sup>43《</sup>臺灣新生報》,四月十一日,4版,〈大學民主化に全力,罷診事件圓滿解決寸〉。 《民報》,同日,2版,〈臺大附屬醫院今起復診,應予學術自由研究,羅校長歸臺 急速解決〉。

<sup>44</sup> 見《人民導報》,四月八日,來論,邱山水,〈臺大附屬醫院罷診問題〉。

<sup>45 《</sup>民報》,三月廿八日,1版,社論。

這個評論並沒有認真探尋發聘及補缺問題的癥結,卻想當然耳的將全省接收後的弊端與臺大此次事件相連結。事實上接收後的臺大兩附屬醫院已留用七十三(56+17)名各級醫職員,其程序亦如評論所言之步驟,此次風波只是編制外醫員們補缺及對委任狀的要求,如此評論是否太過?同樣的,只因周主秘一人的官僚作風,即將此事件與大學的民主化相連結,可見此時社會大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對接收以後臺灣種種現象已蘊積了太多的不滿。四月八日《人民導報》刊載邱山水所撰〈臺大附屬醫院罷診問題〉一文,<sup>46</sup>更將事件之原因完全歸咎於周主任秘書一人:

問題發生的原因,由報紙上得到的智識和其他輿論綜合起來,得到了較近的一個近因,就是周主任秘書一個人的專橫所引起的。還有一個遠因,就是任周主任秘書濫用他的專權的制度。我們大家都知道直接的原因是聘書,聘書的問題弄到要求改造大學的專制制度,即是大學民主化的問題上面來了。可是,我們還希望再進一步發展到「大學的自由」、「學問的自由」上面去。

此文是將社會現象與大學事件牽扯的最佳例證。四月五日,《臺灣新生報》刊 社論:〈臺大附屬醫院罷診平議〉 $^{47}$ 一文,重點云:

此次罷診事件,動因甚微,內容亦不複雜,我們初以為是學校的普通行政問題,而且事件甚小,是不難得到解決辦法的,不意這不成問題的問題,竟引起軒然大波。……

據報載此次事件,係由於一部份助理醫生向學校當局請求發給委任書,其中并有少數無俸者希望改為有薪。……二十一日第一附屬醫院宣布罷診,二十七日第二附屬醫院繼起響應,二院已有委任書及有薪之醫生,亦均參加,事態遂致擴大。日昨該校醫學院學生亦開會支持罷診運動。醫學院基礎學教室全體職員,并向學校提出決議書,要求解決此事。兩者辭意,均超出事件本身範圍,有涉及「學校民主化」及改革學校機構之說。情形遂趨於複雜,而漸有嚴重之勢。我們綜觀此事經過,覺甚為單純,一部份未委無俸的助理醫生,要求加委給薪,希望職業獲得保障,生活可以維持,這是在「人情」中的要求,沒有什麼不正當。學校當局的答覆,因為羅校長不在校,「委任」、「給薪」,代理者不便作主,且人數眾多,影響學校預

<sup>46 《</sup>人民導報》,四月八日,1版。

<sup>47 《</sup>臺灣新生報》,四月五日,1版。

算,希望候羅校長回來解決。這答覆,就代理校長的身份來說,也沒有錯。如果,這問題的本身,就止於此,我們以為不應該弄僵的。因此,我們願就輿論立場,對雙方作公正勸告。

學校當局,辦法沒有錯,但在答覆時言語態度之間,或有忽略輕視對方要求的地方,而致引起反感。這一點,我們不敢必,但我們聽到的,確有這樣的話。有許多不成問題的事,釀成大事的,在起初往往是因了不相干言語的誤會與衝突。辦法雖是,而應付較差,或是使這事難以轉圜的原因吧;同時,這事件遷延時間太長,早應該電請羅校長明白答覆,不應延宕,發生變化。因此,我們希望當局在應付上,稍變作風,且應有明快的態度,或可使問題易於解決。

在要求請委的醫生一方面,我們以為學校當局並未拒絕各位的請求,不過要各位等羅校長回來解決,這短少的期間,各位應可等待。 各位的要求,并未絕望,而遽出以罷診的手段,未免有點躁急。…… 這關係太大,各位絕不能因目前的待遇問題要求解決,而忘掉了醫 生仁慈服務的精神!

此次要求委任者,要求給薪,是正當的事,祗要有過去的成例可援,或是學校事實上可以辦到,社會自有同情與公論,當然可以辦到。 現在以罷診為手段,未免有點跡近要挾,學校對此極感棘手,依則係受脅迫,且開惡例,不依則事態擴大,影響全校。各位應為辦事人設身處地一想,留有餘地,走了極端,便不好辦。……拿罷診作要求的手段,是毫無理由的,各位僅對病者的抱歉,也絕不能得到社會諒解的,這關係各位前途太大,要請各位鄭重考慮一下。

沒有委的人,沒有薪的人,罷診要求,退一百步,或者還情有可原, 已委的人,已有薪的人,加入罷診,用意何在,似乎更無理由可說, 更不應該。如果這說是表示同情,這僅是加大糾紛,無益有害,自 誤誤人,更要不得。

這篇「平議」,在一安定公平的社會中,應是持平之論,但此事發生在接收改制時期,在不同文化交接激盪之時,就不是純粹說理即能說服兩造的。而論及事件擴大、趨於複雜之兩項關鍵—「二院已有委任書及有薪之醫師亦均參加」及「兩者辭意,均超出本身範圍,有涉及『學校民主化』,及改革學校機構之說」,則觸及了事件的核心。醫學部自接收伊始,即全權委託舊帝大教授杜聰明氏負責,除留用日籍教授及廢臺大預科未依其意實行外,有關醫學部大、小

事務幾全依照其意決定。醫學部及各附屬機構留用之臺籍人士(包括已有委任書及有薪之醫師)高達九十三名,何以在無給者補缺及發委任書問題未得結果前,就以怠診方式與學校對抗,並指責學校官僚、不民主?先前與羅代校長之交涉如何?是否曾遭拒絕?何以利用羅氏回重慶述職時期,爲難其代理人?這些都是身負醫學院重任的杜聰明氏應該有所交代的。

臺大醫院罷診事件固與臺大決策當局有直接關係,但間接亦反映出臺灣社會對接收以後政治、社會情勢的深切不滿。知識分子既爲社會中堅,其觀察與感受亦最敏銳。前引事件期間《民報》與《人民導報》的評論就是最佳證明。此一罷診事件因臺大醫師與周主秘接洽聘書問題,不滿其態度而爆發,知識分子群體似突然間找到一突破口,遂一股腦兒將不滿的訴求全藉此事盡情發揮。但若罷診者了解羅代校長在接收時期的苦心作爲,瞭解羅氏正是因爲遭到臺灣省政當局的干涉人事,拒墊撥經費給臺大而晉京述職、交涉的話,到底是誰在維護「大學的自由」、「學園的自由」?此一事件,是共謀臺大接收改制的外省、臺籍知識分子間的巨大裂痕,令杜聰明與學校當局互信盡失,也是一個多月後羅宗洛代校長拂袖而去的原因之一。

# 五、衝突例二:二二八事變前後林茂生的角色

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羅宗洛代校長因臺大經費問題仍不得解決,再度赴京交涉。行前組成校務委員會,以教務長戴運軌、總務長陳兼善與省教育處長范壽康三人爲常務委員,代理校務。<sup>48</sup>羅氏赴京後,即辭去臺大代理校長,臺大與教育部迭相慰留,未得結果。八月,教育部發表隨羅氏來臺大接收、並任工學院院長的陸志鴻爲新任臺大校長,十三日,陸氏抵臺履新。陸之得任校長,係出自長官公署向教育部之推薦,因此陸任職後頗聽命於省政當局,相當程度出現公署脅制臺大校務之現象。<sup>49</sup>

本文所欲探討的另一臺大臺籍領袖林茂生氏。林氏於接收期間輔佐羅氏, 負責文政學部之接收工作,接收以後林氏並未能循他人例證擔任文學院院長, 僅被聘任爲先修班主任,但仍實際處理文學院院務。<sup>50</sup>林氏又同時擔任《民報》

<sup>48</sup> 詳參抽作, 〈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 (1945-50) ——羅宗洛接收時期〉, 頁480。

<sup>49</sup> 詳參拙作,〈論陸志鴻校長治學風格與臺大文學院(1946.8-1948.5)〉,頁268-272。 文中有由臺大角度論述林茂生之校內行事與活動,請參閱。

<sup>50</sup> 詳見同註48, 頁488-489。

社長,<sup>51</sup>是具有學界領袖與輿論代表雙重身分的重要人物。由於林氏的雙重身分,使得他所扮演的角色趨於複雜。以臺大醫院罷診事件爲例,《民報》在事件中率先發表社論,要求大學民主化,但林氏有臺大教授的身分,此一社論是否代表林氏之看法與意見?頗值得探索。羅代校長返校、罷診事件平息後,林氏曾向羅代校長報告醫學院派人煽動校總區及先修班學生情形,<sup>52</sup>似乎林氏本人並不以醫院之罷診事件爲然。此一矛盾現象的持續發展,似與二二八事變林氏之遇害有重大關聯。

三十五年八月,中央政府派遣閩臺區接收處理工作清查團來臺視察接收工作,林茂生會晤清查團團長劉文島時,曾引比喻訴說臺灣光復後之情狀:

臺灣譬如祖國的小姐,被日本掠去了五十餘年,勝利後,由祖國來 一般兄弟,到臺灣尋出被他人掠去的妹妹,是當然之事也。但是這 般兄弟不能尋出了自己的小妹,反而爭奪寶島之金銀財寶,奪去後 不顧自己的小妹。

劉文島知道臺灣同胞對接收的怨恨,更引申林氏比喻云:

本人想,這種人,不是奪了寶島的金銀財寶,不如(說)奪了自己 妹妹的金銀財寶。這回父親的蔣主席命令我們到臺灣,慰安受五十 餘年痛苦的妹妹,或是搜出奪去妹妹金銀財寶的可惡兄弟,加以處 置,希望大家不要客氣,積極協力。<sup>53</sup>

林氏以比喻說劉文島氏,實反映林氏與多數臺籍知識分子一樣,對接收後的劣 行惡狀十分不滿。

<sup>51 《</sup>民報》係由日治時期參與《興南新聞》(一九四四年三月為總督府整併為《臺灣新報》的六家報社之一)的班底所組成,創刊於三十四年十月十日,林茂生被推為社長,彼時林氏尚未入臺大任職。該報發行人吳春霖,總編輯許乃昌,總主筆陳旺成,均為二、三十年代以來臺灣民族運動、社會運動分子。該報言論與林茂生之關係,有林氏「只不過是名義上的社長,而社內完全看不到他的影子」、「只掛名,很少露臉」與「在林茂生的編輯指引下,該報很快地成為臺灣人民利益奮鬥的十字軍」兩說。前者出於曾任《民報》編輯的吳濁流,後者則出自與林氏熟識的美國領事萬超智(George Kerr),詳見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頁162-167。林宗義則回憶指出其父與陳旺成同寫社論時情景。本文發現《民報》言論與林氏表現矛盾處甚多,或在不同時期林氏對《民報》言論有不同的影響。

<sup>52 〈</sup>日記〉,四月十二日記:「林茂生、許汝鐵報告醫學院派人來煽動先修班及本部學生情形。」

<sup>53 《</sup>民報》,八月二十九日,晨刊,2版。

三十五年九月四日,報載臺灣省長官公署制定「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或稱「公職追放令」),對日據時代參與皇民奉公會工作者,將停止其公權。次日,《民報》報導謂此一辦法無異原子彈突然來襲,在臺灣社會捲起大旋風,叫痛快者有之,起惶恐者有之,仍懷疑觀望者亦有之,希望公署能盡速發表詳細辦法,以釋群疑。<sup>54</sup>再次日,《民報》晨刊發表〈停止公署的原子彈〉社論,重點云:

光復以來已閱一載多,接收工作已告完畢,各級民意機關已成立, 參政員亦選出了,可以說地方自治的條件和基礎已整備,然而停止 公權的原子彈投下,參政員、省縣市參政員、公務員等該當者當不 在少數。……平地裏起了一大波浪。

停止公權的決斷可以說是一種革命。在日本占據時代,為出風頭、 貪名利,甘心做走狗的所謂御用土豪劣紳,……對此不肖分子應該 要有一番肅清工作才是。日寇時代,並不是為經濟生活所逼,而自 動的要求擔當違背本省人民的利益及損害國家的權益工作之土豪劣 紳,當這肅清的時候,要自己反省退場,莫強辯,莫出怨言。後來 方有自新之路可行。

對臺胞有無漢奸問題,國內的判例已決臺胞不適用漢奸處置法。我們相信其寬大的判決,是中央政府體念臺胞受日本壓迫榨取的苦楚,出於同胞愛的措施,蔣主席對可怨的日本尚且以德報怨相待,倘有對在日本壓迫下,無言可訴的善良同胞,視為敵人,或譏為奴化,故劃內外省人感情隔膜之鴻溝者。其意叵測,實為遺憾。

對這停止公權的措施,想無反對者,可是不無失了時機之嫌。而且未見提及比參加皇民皇(應為「奉」)公會更失民族正氣之徒的處置,未免有網漏吞舟之魚的感慨。對這點,省當道須要冷靜慎重考慮不可輕輕裁斷。55

社論將此措施視爲「原子彈」,視爲「平地裏起了一大波浪」,視爲「革命」,繼言應該肅清「御用土豪劣紳」,至於情節稍輕之「土豪劣紳」,要「自己反省退場」,但最終則以國內判例已決「臺胞不適用漢奸處置法」,婉轉說這是將「無言可訴的善良同胞」,「視爲敵人,或稱爲奴化」,是「故劃內外省人

<sup>54 《</sup>民報》,九月四日、九月五日,晨刊,2版。

<sup>55 《</sup>民報》,九月六日,晨刊,頭版,社論。

感情隔膜之鴻溝者」,結論則認此措施有「失了時機之嫌」,主張應辦「比參加皇民奉公會更失民族正氣之徒」。實反映臺籍知識分子,雖不敢公然反對此一措施,但對此一辦法是持抵制與保留的態度。

九月五日,即《民報》刊出社論前一日,此辦法見報之第二天,林茂生氏突然申請退出彼所參與之國民參政員選舉活動。<sup>56</sup>按臺省國民參政員之選舉採間接選舉制,由省參議會就登記之三十九名候選人中選舉,名額八名。選舉已於八月十六日舉行,結果林忠(22票)、林宗賢(18票)、羅萬俥(16票)、林獻堂(14票)四人確定當選,其餘候選人廖文毅十三票,但有一票在姓氏「廖」部分爲墨汁污染,吳鴻森、林茂生、杜聰明、陳逸松及楊肇嘉各得十二票,但楊氏有一票之「肇」字誤書,造成疑義,由選委會向內政部請示。內政部決定二疑義票均屬無效,<sup>57</sup>遂形成廖、吳、林、杜、陳五人均爲十二票,應由五人中抽籤決定四名之局,並訂九月六日爲抽籤日。不意,林氏於抽籤前一日(五日)晚間致函省參議會秘書處,聲明放棄抽籤之權利。選委會以林氏退選手續不完備未同意其聲明,次日林氏亦親自出席抽籤會,結果廖文毅氏落選,包括林茂生在內之四人當選爲國民參政員。<sup>58</sup>林氏當選後,以「不改初衷」爲由,於七日再提辭呈,並發表聲明書:

鄙人於參政員選舉抽籤前,已對《民報》同人發表辭退決心,即向 省參議會提出文書。後參議會以為手續不完備,不容辭退,於是參 加抽籤竟得當選。但鄙人不改初衷,慎重考慮之結果,當選後即提 出辭任手續,特此聲明。林茂生。<sup>59</sup>

林氏原積極參選國民參政員,當選後突然宣布退出,據當時省參議會秘書長連 震東的說法,是受長官公署制頒「公職追放令」的影響。林氏曾任皇民奉公會 本部國民動員部長之職,<sup>60</sup>深恐此制施行將被褫奪公權。至於其出爾反爾的過

<sup>56 《</sup>民報》,九月六日,晨刊,2版。

<sup>57</sup> 見《臺灣新生報》,八月十七日,5版。

<sup>58 《</sup>民報》,九月六日,晨刊,2版。及晚刊,2版。

<sup>59 《</sup>民報》,九月八日,晨刊,2版。《民報》,九月六日,晚刊,民意機關欄,有署 名「正義子」〈擁護停止公權辦法〉一文,大力支持「公職追放令」辦法,可見其 時言論之開放多元。

<sup>60</sup> 林茂生在戰爭末期出任皇民奉公會本部動員部長職,在奉公會《新建設》刊物上, 先後曾發表〈不可能より可能へ—皇奉運動の一新兵もして—〉(3卷3號,昭和19 年3月)及〈本島青年に寄す〉(3卷6號,昭和19年6月)二文。

程,《新生報》及《人民導報》皆有追蹤報導,<sup>61</sup>十足突顯林氏性格之矛盾游移。但從之前所引《民報》社論來看,林氏實履行「自己反省退場」之期許,較諸他人而言,不失爲一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值得讚佩。只是他的反覆,引發了輿論與政界對他的不滿與批評。

在此事件前後,《民報》曾多次嚴厲批評臺灣光復後政治、經濟及社會狀況。本文僅引其大者,略作引申。該年八月三日,《民報》社論〈怎樣會感情隔閡?〉探討本、外省人的隔閡問題說:

本省人和外省人感情隔膜,已經達到相當深刻的程度,因此形成了政治、經濟、社會各部門的僵局,是誰都要承認的事實。……現時雙方好像有了意識的對立,或許不減於臺日人對立當時的狀況。究竟是什麼緣故?外省人批評本省人器小,不能容人,甚至加以奴化、排他等種種的妄斷。而本省人對於外省人中許多貪污、舞弊、蠻幹的不良分子,為其數太多,所以視為全體如此,一聞外省人即發生厭惡,遠之唯恐不遠。

古人說: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像現時外省人把一切不能上軌道的事情,只管諉責於本省人之不肯協力,而不知檢討自己的陋劣,一方面本省人因抱有理想和過大的期待,看不慣在國內所謂司空見慣的惡作風,對於官場或民間疊出不窮的惡現象,抨擊責備不遺餘力。在本省人以為排除奸邪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也是權利,而外省人也看不慣這種毫無修飾,單刀直入的作風,以為是過火、不穩。如此互相攻擊,互相責善,感情自然日離日遠。……我們冷靜思維,本省人為愛護鄉土、貢獻國家起見,要時常回憶歡迎光復當時的情緒的熱烈,以自激勵快要灰冷下去的心境。更要自覺我們是繼承著中國民族的血統,而且保持著開臺始祖鄭成功所發揚光大的民族正氣。今後建設臺灣、發展臺灣的推進力,應由臺胞身上發出。把臺灣的凡百事項,處理的有條有段,達成一個名實相符的模範省。……臺胞們應該有此意氣,有此抱負,不能因眼前不肖之徒的弄糟,遂餒其志,致放棄應盡之使命於不顧。

外省人之中,固有一部份值得親愛的人,可是不肖者佔多數,且有 各據要職,而不自覺其卑鄙與無能,時與本省人發生摩擦、衝突,

<sup>61 《</sup>新生報》,九月八日,5版及《人民導報》,九月十三日,均有特稿,追蹤報導, 詳論林氏此事。《人民導報》認為他是在《民報》幹部逼迫下,始提出辭職書。

此即感情隔閡最大的素因。具眼之士,應由此中尋出補救的方案。<sup>62</sup> 論述本、外省人之對立、隔閡頗爲深刻,鼓勵本省人不應灰心,應具更大的抱 負,而責成外省籍之責任者速謀對策,實爲語重心長之作。此其一。

該年十月二十五日爲光復週年紀念日,次日《民報》發表〈祖國的懷抱〉 社論,先引越南與法國之例,說明日人統治下臺胞的境遇,繼而沈痛的說:

在日本統治下, ……我們臺胞的運命, 和安南人確實沒有二致。雖然我們在各方面, 都跟得上日本人, 總是無論什麼事, 皆缺乏真誠積極的意義,沒有生命的躍動。這個原因到底在那裏? 不消說,是因為我們沒有祖國,沒有灌育我們的生命的祖國。

光復當初,臺胞們的熱烈興奮,也是因為待望祖國的懷抱,而情不 自禁所致的。

老實說,重新相逢的祖國,是使我們失望得很,祖國的政治文化的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我們一時感覺非常的失望,甚至於絕望。當然這個念頭是錯誤。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要生存,所以是絕對不能夠絕望的。我們的任務,不僅僅在于建設臺灣,而且祖國的建設,也是在我們的雙肩。我們應該一步一步切實地工作,開拓我們的路徑,我們只有這條路。

在日本人的監視下,有許多的地方,我們不能自主,所以不得不仰人鼻息,而小心行走。現在我們雙肩負著建國的責任,凡事可以放膽勇為,因為有了祖國,有了祖國的懷抱,我們的全身全靈,也就可能自由靈動了。……祖國的懷抱是如此實貴的。<sup>63</sup>

文章述說著臺胞對祖國的渴望及光復後的絕望與激憤,語語沈痛。或許這就是 《民報》言論激越,不避強禦的動力所在,感人至深。此其二。

兩天後,十月二十八日,《民報》又刊社論〈要豫防年底的危機〉,籲請 政府早作準備:

(上略)光復以來的臺灣真象,可惜,未必值得讚稱,臺灣堪做模範省的基礎和條件是充備的。但現在的惡環境,恐怕模範省的口號,終於口號而已吧了。……

<sup>62 《</sup>民報》,三十五年八月三日,頭版,社論。

<sup>63 《</sup>民報》,三十五年十月廿六日,頭版,社論。

我們怎麼特別指出年底的危機呢?因為本省還沒有能給臺胞滿足的好政治,致使釀成危機。其原因都由天下為私的公務員之無能無智所致的。長官的善意,誰都能瞭解。只是長官的班底,多不肖之徒,越法舞弊,致政府的威信墜地,人民不能信用官吏,使守法有良心的公務員,東手無法可施。失業者逐日增加的現象,是表示著社會危機的來臨,同時也是政治經濟的危機。……古人說「民以食為天」,可見吃飯問題是首先要解決。模範省臺灣之建設首在民生,民生若不安定,怎麼理想的計劃都不能夠實現。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而實行分配社會化,工作平等化,也要同時考慮,年底在即,年底的危機不可不未雨綢繆以防止。我們提出數點,以當為政者之參考:

- 一、牽親引戚的人事,要即刻停止,盡量採用臺灣人材。
- 二、田賦徵實的米穀,要以最低價格平糶,救濟平民。
- 三、日產工廠要解放于臺胞,使盡力動工增產,收容失業者。
- 四、不准沒有任務的黨團政軍民等擅帶手槍,要嚴重取締。
- 五、土木工事要照計劃快速實施。
- 六、搜查取締要認真,不可馬馬虎虎擅放犯人。
- 七、蔣主席的訓詞「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軍官民要切實遵守。
- 八、指導者要以慈父之爱,領導民眾,率先示範,實踐三民主義。
- 九、急速創設省立各簡易職業學校,以養成技術人才,供給全國, 其一切經費應由國家負擔。
- 十、無能官吏不可擔任重要工作,須要讓於有能人材。<sup>64</sup>

本文批評省政當局至爲嚴厲,尤以「長官的班底,多不肖之徒,越法舞弊」等 語爲最。文中提出的根本問題,是經濟惡化,失業眾多,解決之道提出「分配 社會化、工作平等化」等,具體建議則有十項當務之急。文中標舉「年底的危 機」,致令政府非但未能體察其善意,且視爲「唱衰」政府的莫大惡意。此其三。

三十五年歲暮,十二月三十一日,《民報》社論〈一年間的回顧〉一文, 再對臺灣當局擔憂:

<sup>64 《</sup>民報》,三十五年十月廿八日,頭版,社論。

(上略)臺灣的政治,卻很缺乏明朗性,鮮見有反映著民意。加之,由內地移入各種惡作風,貪污盛行,奢侈日盛,執法者玩法,虛偽詐欺,殺人越貨,凡社會上所有的惡事象,無一不備,以致到處都是聽見失望怨嘆之聲。再就經濟方面而言,……失業問題,尚無解決曙光。物價波動,只聞奔騰,不見下跌。……民生之困苦可不言而喻了。至於社會上問題,千緒萬端,固非數言能盡。就中有內、外省人之感情隔膜一事,許是最惹有心人擔憂。……其致此之原因甚多,唯雙方能夠自己清算,自己檢討,就無愁不化隔膜為融和了。65

本文因寓檢討、祝望之意,故用語較平和,且提出「自己清算,自己檢討」之期許。此其四。

綜合以上四社論,其時政經、社會情勢之危殆,可明顯看出,追索形成光復後此一惡象之原因,人謀不臧,固爲重要因素,而文化差異亦爲原因之一。即以前引《民報》社論所提十事來看,「牽親引戚」之公、私領域不分現象是傳統中國家族社會之遺風。黨政軍人任意攜槍上街及搜查取締不認真等均代表法治觀念之不足。土木工事延宕,代表傳統社會工作態度與科學規劃、執行的不力等都是。《民報》社論「毫無修飾、單刀直入」的批評,確實爲省方「看不慣」,擔任社長的林茂生,不論與《民報》言論關係之深淺,得罪當道,並帶來日後之殺身之禍,應該可以明顯看出。

另一方面,林茂生辭去國民參政員事件甫落幕,九月三十日,《民報》刊 出〈對臺灣大學的期待〉社論,嚴厲批評林氏任職的臺灣大學:

(上略)對於臺灣大學,記得我們並未有過分的「期待」。我們第一,期待它能保持著在來的「水準」,第二,期待它能對於人文科學方面的研究和講授有些改革,因為在日本時代日人為他們的「高等政策」起見,故意輕視「人文科學」的研究和講授,第三,期待它對於「臺灣的歷史、文化」有所研究,有所講授,因為臺灣大學是建設在臺灣的大學。……平心而論,我們的「期待」並不是甚麼過當或是過分。可是,事實呢?……我們終於不得不感覺不滿,終於不得不感覺失望。……

對於人文科學方面的研究和講授的改革,只看那文學院的院長,到現在沒有來任,教授的聘定又寥寥無幾一事可以推想。現在的陸校

<sup>65 《</sup>民報》,三十五年十二月卅一日,頭版,社論。

長,聽說是一位自然科學的研究家,對於人文科學方面不是專家, 但是我們相信就是不是人文科學方面的專家,也一定會知道用現在 的教授陣容,是一定不能「改革」些甚麼罷。

至於對臺灣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和講授,羅前校長在首次的省參議會,曾大說特說之,他說臺灣大學的使命,就是在於研究臺灣的歷史和文化。對於羅前校長的話,陸現校長未審作如何感想,可是我們相信當沒有反對罷,因為這是過於當然的話。可是,再看眼前的事實罷,大學當局對此,可說完全還沒有做半點的具體的工作。不聽到增設一單位關於臺灣的歷史和文化的講座,不聽到聘任一位關於研究臺灣的歷史或是文化的專家。

臺灣大學當然是我們的大學,我們為著我國的文化計,為著本省的文化計,我們要追究大學當局的責任!<sup>66</sup>

文中所論諸點,特別是對人文科學及臺灣歷史、文化諸「期待」,均爲「過於當然」之語,站在省民與輿論的立場原無可厚非。且證諸史實,羅前校長十分重視的「南方人文研究所」,陸校長正醞釀停辦。但如與社長林茂生聯想,極易產生誤會。林氏時任臺大哲學系教授、先修班主任,代行文學院院長職務,而文中全以人文科學、臺灣歷史文化立場論臺大之非,極易將該文作者與林氏聯想在一起。而「只看那文學院的院長,到現在尚沒有來任」,尤易與未得任院長之林氏相牽連。而「我們要追究大學當局的責任」一語,用辭之重,很難讓臺大當局釋懷。林氏雙重身分之矛盾,在此又添一椿。其時臺大當局已較羅宗洛時代不同,頗聽命於省政當局,林氏除得罪政界外,臺大當局對其敵意亦增。

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林氏並未參與,但竟於三月十一日被捕遇害。 其罪名為:(1)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2)強力接收臺灣大學;(3)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臺灣獨立等三項。<sup>67</sup>其中前二項皆指控其在臺大校園內之活動,但林氏並未涉入校內外之活動,已經辯明,<sup>68</sup>政府竟以此為主定其罪名,校內外之沆瀣一氣,明顯可見。反而於事變期間被指控真正秘謀接收臺大的杜聰明氏,因躲藏得宜而避過大禍。

<sup>66 《</sup>民報》,三十五年九月三十日,頭版,社論。是日起,《民報》晨刊增刊,晚刊 停止出版。

<sup>67</sup> 見陳儀,〈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92),頁174-177。

<sup>68</sup> 詳參批作,〈論陸志鴻校長治學風格與臺大文學院(1946.8-1948.5)〉,頁283-289。

杜聰明院長在附屬醫院罷診事件中,辜負了臺大當局原先對他的善意,彼此間喪失了互信。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杜聰明回憶說:

我們當時因為是參政員中央民意代表,所以我們參政員訪問臺灣省臨時議會議長,同往行政長官公署拜訪陳儀長官,與各處長會合討論對此事件之處理方針,首先要決定其名稱。陳長官意見,此事件開始之二月廿七日,但是事實上是二十八日大發生,所以要稱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長官公署處長及參政員及省議會議長、議員、市議會議長等聘為委員來共同處理,所以筆者亦被聘為處理委員會委員……。

嗣後處理委員會每日在中山堂開會,筆者以委員身份參加出席,但 無特別意見發言。……此時臺灣名士林茂生、陳炘、施江南、林旭 屏等被殺死,已經不知去向了。……筆者以參政員民意代表身份, 被託調查施江南之消息中,有人好意報知你亦在被捕名單中,要緊 走避較安全云。所以筆者不管如何,為自身安全計,往臺北市懷寧 街林正霖宅走避,不敢回家過夜……其間靜觀經過如何,幸無人來 福州街宿舍要捕筆者,少得安心矣。但不知如何原因,三月十六日 陸校長就免筆者臺大醫學院長,換嚴智鐘教授為第二任院長。所以 臺灣省科學振興會同仁感覺不平,去訪問陸校長質問之。關于參加 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委員,以後受很多的冤枉者不少其數……其他 筆者當時還有一點感覺不安者,嗣後為處理二二八事件中央政府派 白崇禧將軍來臺灣,其在臺北賓館之白將軍之歡迎會,筆者是參政 員身份,如何筆者無名單在內乎,但經過十餘天白崇禧任務完了要 回中央時之送行會,筆者既有名單在內,而且在此歡迎會筆者能得 親自與白將軍歡談,及報告筆者老早就是中華民國革命黨員,如此 始得放心歸福州街宿舍。但以後再有風聲,謂白崇禧將軍回去以後, 陳儀長官要出來捕人,因此再以安全計,筆者就往楊景山宿舍走避, 以後臺北很平靜,無事發生,一禮拜後始回福州街居住之。二二八 事件以後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廢止,臺 灣省政府成立,魏道明任為臺灣省政府主席,筆者由國民政府主席 蔣中正、行政院長張群任命為省政府委員,此時筆者感覺非常歡喜。 但不是歡喜有地位,反而是歡喜能除去關于二二八事件之不安,無 犯法身份獲得保證,能公開出面是也。69

<sup>69</sup> 杜聰明, 《杜聰明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 頁198-200。

事件時任醫學院教授,事件後接任附屬醫院院長的魏火曜則回憶說:

事發時,有一小群臺灣人想接收臺灣大學,要臺灣人當校長,所以 在醫學院召開會議,會議開到很晚才散。散會後,就聽說戒嚴了。

#### 又說:

事件發生前,陸志鴻校長不希望杜先生再當醫學院院長。臺大醫學院同仁推了六、七個人(包括我)向陸校長提出說明,希望陸校長不要辭去杜先生,因為臺大醫學院需要他。六、七個人中只有我說話,而陸校長也很客氣。<sup>70</sup>事件發生後,杜先生躲了半年,也不知道在那裏,因為他在此之前曾參加政治運動,所以事件一發生就有先見之明,如果不逃,可能會被害或被逮捕。其間嚴智鐘教授任院長。<sup>71</sup>

二人之回憶,頗有出入。事實上,《杜聰明回憶錄》對臺大校園發生之事情多所隱諱,像罷診事件不見於回憶錄是其一,二二八事件中籌謀「接收臺灣大學,要臺灣人當校長」事是其二。其實二二八事件中杜氏圖謀接收臺灣大學之說法,另有其他史料佐證,<sup>72</sup>故杜氏被免去醫學院院長並非無因。事實上,自三十五年底臺大第二附屬醫院劃歸省政府後,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已由陸校長改派陳禮節氏擔任,杜只專任醫學院院長。但如杜氏回憶錄所述屬實,則黨政軍等並未曾派人逮捕杜氏。杜氏與林茂生二人身份、地位相類,而事件期間林氏參與政治活動不如杜氏多,但林氏竟被捕遇害,杜氏反躲過迫害,其間值得探索的問題仍多。<sup>73</sup>倒是杜氏回憶事件後,彼得於歡送會中晤見白崇禧氏,告以彼係「中華民國革命黨員」,重拾中央對彼之信賴。四月三十日行政院會通過撤廢臺省長官公署,改設臺灣省政府,魏道明爲主席,杜聰明氏被任命爲省府委員。<sup>74</sup>

<sup>70</sup> 魏火曜又在別處說:「陸志鴻校長任內,也曾要杜先生卸任院長職,但院內年輕醫師代表們去溝通後,陸校長才沒有變更人事。」魏火曜,《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頁51。

<sup>71 《</sup>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33-35。

<sup>72</sup> 當時任職臺大之年輕同仁,有校印嘗為杜聰明所奪之說。閩臺監察使楊亮功,〈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引白鵬飛氏採林茂生說,有杜聰明曾勸林氏「此時不來,尚待何時」,但林氏未理會之說。見蔣永敬、李雲漢、許師慎編,《楊亮功先生年譜》(臺北:聯經,1988),頁367-368。

<sup>73</sup> 有關林茂生被捕之第三項罪名:「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臺灣獨立」,據聞有新資料出現,詳情尚未刊行。

<sup>74 《</sup>新生報》,三十六年四月三十日,2版。

# 六、杜聰明、莊長恭與傅斯年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行政院會核准臺大校長陸志鴻辭職,改聘甫當選院士之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莊長恭(丕可)氏爲臺大新任校長。莊氏係福建晉江人士,與杜聰明有姻親關係。按杜夫人林双隨出身霧峰林家巨室,其父林仲衡娶泉州莊秋渠爲妻,係莊長恭姑母。該年三月廿二日杜聰明應教育部之邀,飛滬轉南京,參觀中央研究院、中央衛生實驗院等機構,四月六日始返臺。<sup>75</sup>四月二十二日,杜再偕妻林双隨赴滬,寓「莊表哥」宅。杜氏夫婦歷遊滬、寧各地名勝後,五月四日杜夫人先行返臺,杜氏則往北平講學,十一日再返上海,又羈留十日,於廿一日返臺,<sup>76</sup>兩月間兩度往返滬臺間。時莊氏初被任命爲臺大校長,對臺大並不了解,杜氏取得機先殷勤導引莊氏,遂得莊氏之信賴。六月一日,莊氏就任臺大校長,除重新聘任杜氏爲醫學院長外,聘丁燮林爲教務長、程瀛章爲主任秘書、楊景山爲總務長、陳英湛爲事務兼工務組主任、蕭壬鍫爲出納組主任等。<sup>77</sup>總務長以下人事幾全爲杜聰明所推薦。<sup>78</sup>

莊長恭任校長前後半年餘(37.6-38.1),遭遇兩重大事件而去職。前一事件爲「解聘教員事件」,後一事件爲「續招轉學生事件」。前者,因莊氏銜命整頓臺大,各方期待甚殷,於六月到任後,即停聘三十餘名教職員(一說一百三十餘名),引起大風潮。被停聘者自七月七日起組織「解約返鄉教授聯誼會」,向學校要求返鄉旅費,至七月底始達成協議,由校方致送三個月薪津爲旅費。此事稍平,又有名爲「護校委員會」者,發「告全國人士書」,除攻訐臺大校務外,並指控莊校長八大罪狀。莊氏不堪其擾,於七月下旬倦勤,向教育部請辭,旋於八月一日離臺飛京。<sup>79</sup>

八月中旬,代理校務之丁燮林教務長亦倦勤謀去,十七日臺大學生自治聯 合會開會討論校務,事後印發「告各界人士書」,堅決支持慰留莊校長。時教

<sup>75 《</sup>臺大校刊》12期(37.4.16),2版,〈杜聰明教授返校〉。

<sup>76 《</sup>杜聰明回憶錄》,〈杜林双隨傳〉,頁356-357。

<sup>77 《</sup>臺大校刊》16期(37.6.16),3版,〈新人事〉。

<sup>78</sup> 總務長楊景山為杜聰明摯友,二二八事變期間杜嘗往楊氏住宅避難,已見前文。楊 景山又嘗為杜長女杜純淑說媒,見《杜聰明與我:杜純淑女士訪談錄》,頁215。陳 英湛原任總務處事務組主任,二二八事變後去職,此次重任事務、工務二組主任。 十一月十六日楊景山總務長去職後,陳、蕭亦隨之去職,調往醫學院工作,顯見皆 與杜院長友善。見《臺大校刊》20期(37.12.5),3版,〈人事動態〉。

<sup>79</sup> 詳參《公論報》此期間之報導與評論(社論)。《新生報》所載不詳。

育部長朱家驊亦堅決慰留莊氏,莊氏遂打消辭意,重返臺大。莊氏聘得生力軍 盧恩緒(曾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任教務長)、沈剛伯(中央大學歷史系教 授,任文學院院長)、方東美(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任哲學系主任)等同來, 又請前校長羅宗洛來臺協助推動校務。<sup>80</sup>八月廿九日莊氏返臺。不料,又發生 學生阻撓續招轉學生事件。

三十七年八月臺大招考大一新生及二、三年級轉學生,九月十六日放榜。因各方之壓力,除將備取生一律錄取外,又決定續招轉學生,於十月二十六日報名,二十九日舉行考試。不料二十九日續招轉學生考試時,臺大學生會派人到考場勸阻全體考生離場,遂使考試無法進行。學生會反對之理由有三:(1)第一次招生已招有轉學生,(2)各院系二、三年級學生人數已達飽和,(3)此次招生係爲三方面之介紹請託而舉行,報名考生大部分係來頭頗大者,學校不是商場,學生應該表示反對。莊校長接見學生代表,除解釋學校處境困難外,又再度表達辭職之決心。<sup>81</sup>十一月四日,莊校長擬搭機赴滬時,學生自治會聞訊趕往機場勸阻,才得以挽回校長。<sup>82</sup>莊校長返校與各院院長商討校務後,決定「苦撐下去」。事前十一月一日,臺大第二十七次校務行政會議已決議續招轉學生計畫不變,交招生委員會定期再考。<sup>83</sup>後於十一月十三日順利繼續考試。<sup>84</sup>

十一月十五日,爲臺大三週年校慶,久爲教授所詬病之總務長楊景山去職, 由農學院劉伯文教授接任。<sup>85</sup>但未及一閱月,盧恩緒教務長又請辭,莊氏於十二月七日悄然離臺返滬,將校務交予醫學院長杜聰明代理。<sup>86</sup>當時杜聰明不但 代理校長,還代理教務、訓導二長,總務長劉伯文、理學院院長沈璿、農學院

<sup>80</sup> 詳參《公論報》報導。並參羅宗洛,《回憶錄》,〈臺灣之行:第二次到臺灣〉, 頁30。

<sup>81</sup> 見《公論報》,三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3版。

<sup>82 《</sup>公論報》,三十七年十一月六日,3版。

<sup>83</sup> 詳參臺大第27次 (37.11.1)、臨時 (37.11.3)、第28次 (37.11.6) 《校務行政會議 記錄》。

<sup>84 《</sup>公論報》,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3版。《新生報》,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5版。

<sup>85 《</sup>公論報》,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社論〈愛護臺大,整頓臺大〉云:「現在總務部門工作,連教授都以為不行,何以遲遲不予換人?」按羅宗洛氏說法,是繼任人選難產。劉伯文出身北海道帝大農科,與羅宗洛有同學之誼,或由羅氏說動其出任總務長。《臺大校刊》19期(37.11.20),3版,載劉氏自十一月十六日起視事。

<sup>86 《</sup>臺大校刊》21期(37.12.20),2版,〈莊校長晉京,杜院長代理校務〉。

院長陳振鐸等亦皆請辭,當時校務之混亂,由此可見。87

莊長恭校長的失敗,他在十二月十五日致新任校長傅斯年函中說:

弟忝長臺大,忽忽半載,因才力薄弱,又無班底,以致一事未成,而心力已交瘁。近因積勞成疾,再無心力應付,不得已於本月七日回 滬療養。將校事暫交託醫學院長杜聰明先生代理,并一面電請驅公 (按:朱家驊教育部長,字驅先)另覓賢能接充。……臺大積弊太 深,非得一資望能力如吾兄者,實無以振刷精神。<sup>88</sup>

而曾赴臺協助莊氏之前任校長羅宗洛,亦曾致書繼任校長傅斯年,有云:

臺大本無嚴重事,不可(按:莊長恭字)神經脆弱,略有小事,即便慌張,過於消極,為之友者未肯出全力相助,至造成今日之局面。臺大師生極盼有魄力之人主持校務,兄去臺大,全体皆極歡迎,杜聰明周圍之少數臺灣人或稍失望,但一般臺籍教職員及臺籍學生皆深明大義,絕無出亂子之可能。杜為人甚機警,兄略垂青眼,彼必能效犬馬之勞也。留日帝大出身之教授共三十餘人,人數雖多,然彼此間意見極深,不成團體,不生作用,其較優秀者皆為弟之好友,兄去絕無問題。弟徒有熱忱,全無能力,臺大墮落至此,弟深感責任,於太重到臺灣小住兩個多月,雖竭我驚鈍,終於一事無成,尤覺痛苦,極願從此洗手不問臺大事。但 兄以病身,尚出荷艱鉅,弟何人斯,敢東手傍觀?如有驅策,唯力是視。……

總之,臺大事內部並不難辦,目前需要健全之班底,即教務、總務、訓導三長與主任秘書,使事務納入正軌。至於名流之延聘,不稱職者之肅清及各院之改組,祇好圖之以漸。對外之關係必須努力重整,因此半年間,丕可完全不注意外務,與省府、省參議會間感情極劣,因臺幣之存在,必須向省府取得一部分之經費,其他如房屋、治安等事,如省府不合作,事倍功半,年來臺大之無生氣,半由於此。解決對外問題,在兄固輕而易舉者也。

臺大文、理兩院需人甚急,與本院合作不成問題,本院人員有功課可教者,聘為教員,照向例可支薪,唯低級人員,如助理員之類,

<sup>87 《</sup>臺大校刊》23期(38.1.20),3版,〈杜院長維持校務,勞苦功高,全校均表欽佩〉 一文。

<sup>88</sup> 見《傅斯年檔案》(以下簡稱《傅檔》),編號Ⅲ:358。

較難安插。住處醫學院空屋甚多,如得杜聰明之合作,稍加修理, 即可居住,市政府保有敵產甚多,可以商借。

對臺灣人做事,第一要公平,第二要直捷,第三要堅決。應發脾氣時可拍案怒罵,最忌游移不定、賞伐不明。不可犯此病,故政令不行。兄辦事果斷,當能一掃積習,<sup>弟</sup>不勝馨香禱祝之至。<sup>89</sup>

此函以親見莊校長行事之友人,對莊氏任職臺大期間之作爲,提出檢討,是最直接的觀察。有以下數事值得注意,其一言莊氏本身之問題,計有「神經脆弱,略有小事,即便慌張,過於消極」。性格則「游移不定、賞罰不明」。其次,謂莊氏完全不注意外務,與省府及省參議會間關係極劣,形成其另一困局。其三,則分析臺大校內有兩大勢力,一爲以杜聰明爲首之臺籍教職員,一爲以留日帝大爲主之教授群。文中首提前者,視之爲首要課題,如能妥善安排,校務應無問題。又言「杜聰明問圍之少數臺灣人或稍失望」,似對杜聰明無好感。羅氏於光復後來臺大接收,最先與杜氏接觸,受其指引、接待處甚多,又率先委託其爲接收委員,負責醫學院整體接收工作,此時對杜氏之看法,明顯有不以爲然之意。三十五年附屬醫院罷診事件應爲遠因,二二八事件之聽聞及羅氏來臺助莊校長穩定校務期間之見聞,則爲近因。數日後,羅氏再致函傅氏,論校長發表後杜氏之失望云:

杜聰明之失望是意中事,校長無分一也,院長不穩二也。今如以雷霆萬鈞之力解決此人,此時確是好機會。但恐引起多數臺灣民眾之反感,如假以辭色,仍長醫學院,則彼亦可供驅策。丕可深知杜之心理,可與熟商。為免生枝節起見,可請騮先致函杜聰明,囑特別幫忙,彼即可變消極為積極也。90

當時銜傅斯年命來臺謀中研院史語所搬遷事務的芮逸夫先生先後有二長函致傅氏。十二月二十日函云:

其時適為預定回拜臺大代理校長杜聰明先生之期(因前一日晚間, 杜曾專誠來旅舍訪晤也)……首先即重申其極表歡迎本所遷入之 意,……嗣即出示朱部長(按:教育部長朱家驊)來電,略謂莊校 長辭職後,校務承渠代理,公私俱感。現已徵得先生同意,出長臺 大,不日即可到臺,請其協助一切云云。並對逸盛稱先生之偉大,謂

<sup>89 〈</sup>羅宗洛致傅斯年函〉 (37.12.19) , 《傅檔》, Ⅲ:1337。

<sup>90 〈</sup>羅宗洛致傅斯年函〉 (37.12.22) , 《傅檔》, Ⅲ:468。

不願當教育部長,不願當立法院副院長,而願來長臺大,實臺大之光榮。渠願竭盡心力,協助一切。臺大教職員千七百餘人(!!!),學生二千四百人,無不竭誠歡迎,謂望早日蒞臺。教職員中,外省人約佔什一之數,什九皆臺人,渠敢擔保絕無問題。學生中外省人占百分之十強,歡迎權威學者來長臺大。渠對學生談話,曾謂先生為史學權威,兼為政論家,將來可使臺大能與政治配合。學生聞言,極表欣幸云云。……昨日為星期日,晤陳達夫(按:即陳兼善,臺省博物館長,臺大教授),談臺大內部情形甚詳。(1)經費問題,確甚嚴重。……(2)人事問題,亦甚複雜。本省人有派,外省人亦有系。本省人中,杜可代表一派,另一派則對杜皆貌合神離。91

#### 十二月二十四日雨, 又云:

惟醫、農二學院均係整套的,稍一不慎,則易致牽一髮而動全身。 一般說來,醫學院組織較密,成績亦佳,且甚安定,可不事更張。92

綜合各方意見,傅任校長後仍續聘杜聰明任醫學院院長。傅校長就任後,除處理校務外,有相當多的時間花在附屬醫院事務上。他協助魏火曜院長在三十九年中有一系列改革臺大醫院的辦法陸續實施,顯著改進了醫院的管理與績效。<sup>93</sup>但與杜聰明之相處就不同了。魏火曜先生回憶說:

在當臺大醫學院院長時,杜(聰明)先生認為大陸來的人不懂醫學研究,而大陸來的人又以為日本醫學落後,互相之間處不來。杜先生頗有抵抗當局的意思,弄得當局很不高興。在傳斯年當校長時, 杜先生就常和他衝突......94

魏氏又論民國四十二年八月接杜任臺大醫學院院長事說:

錢思亮校長要我當醫學院院長是有原因的。那時美援會和臺大當局 希望改革臺大日本式醫學教育,但杜院長和一批年輕醫師不願意改, 所以無法讓他繼續當院長。……當然,其中還有很多政治因素。<sup>95</sup>

<sup>91 〈</sup>芮逸夫致傅斯年函〉(37.12.20),《傅檔》, No.94-2。

<sup>92 〈</sup>芮逸夫致傅斯年函〉(37.12.24),《傅檔》,No.94-1。

<sup>93</sup> 參抽作,〈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孟真先生在臺大),《臺大歷史學報》20期(1996), 頁135-136。

<sup>94 《</sup>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51。

<sup>95 《</sup>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49。

其實,傅校長與杜聰明共事後,對杜之處事方法、態度了解愈多,愈不能苟同 其做法。三十九年十月二日,杜聰明有代電致傅校長:

> 一、承面詢關於醫學院之缺點及需要補充改進各節事項,茲陳述如 下:

自我國抗戰而至本省光復以來,計經十年之久,在此期間:

- 1. 本院各種專門雜誌及圖書均未有添置或補充。
- 各種研究設備經久而損壞或殘破不堪再用者,為數甚多,且 各種儀器亦未能如意補充。
- 3. 各種新式儀器更未曾添置裝備。
- 4. 各年級學生人數逐年增加,而原有之實習儀器既不足分配, 又未有財力以供增購。
- 5. 戰時被炸殘跡、殘垣、斷壁等,因限於經費,未得完全拆除。
- 6. 院址四週只有鐵絲及植樹以為邊界,並無圍牆隔絕內外,故 防範竊盜至感困難,影響院內治安頗巨。
- 建物以及電器設備方面因年久失修,均有從速修建之必要, 俾以保全其有用價值,其間尤以雨漏部分,如不迅予修復 者,恐有漏電發火之危險。
- 8. 教學上亟需補充之顯微鏡及器材、藥品等類,謹附列清單乙 份共廿壹頁,以供核閱。
- 二、謹瀝陳以上數點,電請鑒核,並祈指示整頓辦法,是為盼禱。<sup>96</sup> 傅校長收閱後,經五十餘日之思量,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回覆杜院長函:
  - 一、為酉冬醫秘字第375號函奉悉。所示各項,固為應辦之事,然 尚有若干更基本問題在。醫學院之最大毛病在乎不能層層負 責,其結果乃無人負責。即如江金川事發生以後,其責任弟意 認為蕭××最重,而亦未能將其即行免職。以後楊如萍盗案, 彼又持「校本部自取」之說,弟深感奇怪。近乃又有發□多時 以□失竊之事,此一事無疑責任在蕭××。故一切行政果如此 辦下去,則無論學校花多少錢,皆不能有功效也。又如醫院不

<sup>96 39</sup>年10月2日,〈酉冬醫秘375號函〉。見《臺大發文歸檔簿》,第11冊。

稱職之總務主任吳君, <sup>弟</sup>向魏院長說了半年, 乃由<sup>弟</sup>將其免職, 而先生又將其調往醫學院, <sup>弟</sup>亦勉強同意。事務行政如此辦下去, <sup>弟</sup>絕不見有何方法可以改進。此所舉例, 亦不過一部分而已。此其一也。

- 二、<sup>弟</sup>數次自行看醫學院,所謂研究室,無人者多,有人者少,桌上塵土堆積,欲覓一人,以找不到為經常,即找先生亦甚費事。 此其二也。
- 三、總之,先生既不能有比較多之時間用於行政,同時醫學院亦無 代先生辦事者,<sup>弟</sup>經常打電話找人,已感困難。至于推行改進 之說,每次更屬石沈大海,<sup>弟</sup>實有隱痛。
- 四、今見先生來信,似乎貴院之缺欠,全在經費,<sup>弟</sup>完全不能同意。 以今日貴院之泄泄沓沓,即使外國人以辦協和醫學院之費用加 之貴院,亦無辦法。蓋有人負責,方可以做事,層層負責,然 後可以推行;責任分明,精神提起,然後花錢有效。今將一切 責任推之于無錢,則有款兩萬元一次被人偷走,其他貴院支出 之款,有時稽核委員會大不□□(疑:為然二字),<sup>弟</sup>正在作 難。此中毛病究在乎無錢,抑不負責耶?
- 五、至于人事之任用,<sup>弟</sup>如認以為某一學院可以放心,即不干預, 如不能放心,只有先查而後同意。即如貴院近日所提請任用之 人為例,<sup>弟</sup>實莫明其妙。如某君毫無法醫經驗,而年已五十六 歲矣,而先生提請其為法醫學助教。又如某君履歷並非確實, 而先生提請其為秘書。煞費苦心然後出之,假如先生用心辦理, 則<sup>弟</sup>何苦多費心思?
- 六、以弟之看法,貴院之作風,在乎積年以來不以辦好為目的,而以見好于各方面之人為目的。如繼續循此政策,則醫學院欲上軌道,乃絕不可能之事。所示各節,茲綜合答覆如左:

#### (一) (略)

(二)原信第四項:「各年級學生人數逐年增加,而原有之實習 儀器既不足分配,又未有財力以供增購」。查貴院人數之 增加,皆先生一手所辦,當時何以如此辦理,<sup>弟</sup>實不能了 解。<sup>弟</sup>到任後所招之學生,今仍在理學院醫預科,亦大減 于前。<sup>弟</sup>既每年招七十人,即必為此七十人打算,並不如 當年招進一班將近二百人而不作打算。

- (三) (略)
- (四) (略)
- (五) (略)
- 七、總之,辦事之要點在精神振作,精神集中,肯負責任,此等事情做到,然後方有經費之問題。若將一切事項歸之于無錢,而 人之泄泄沓沓如故,<sup>弟</sup>實未見其可也。
- 八、<sup>弟</sup>前與先生所談者,可開一修理計畫,當盡量協助(今仍如此), 今先生乃指此為整頓之計畫,則文不對題,輕重倒置矣。且整 頓在乎精神,在乎責任,如以為一切在錢,而錢又隨時可以為 人偷去,則<sup>弟</sup>萬萬不能同意。除應辦各事另交工務組辦理外, 相應奉復,仍希查照見復為荷。<sup>97</sup>

此函未見杜氏回覆。該年十二月十二日杜氏即飛香港轉美國,展開長達七個月 的歐美醫學教育考察之旅。<sup>98</sup>又不數日(十二月二十日),傅校長猝逝於臺灣 省參議會。

杜氏素負人望,自光復之初,受羅宗洛特派員信賴、倚重以來,先後與四位校長相處,擔任醫學院院長。陸志鴻校長在二二八事件前即想免其院長職務,原因不詳,因醫學院教師代表之請願而未行。至二二八事件後,始以「棄職逃亡」之由去職,<sup>99</sup>或可歸因於政治因素。待國府發表莊長恭長校後,杜氏以其靈活之交際手腕,取得先機獲莊氏信賴,除恢復醫學院院長職位外,莊校長之總務系統自楊景山總務長以次,皆杜聰明班底。但因表現不佳,不數月即改組離職,成爲莊氏求去原因之一。及傅校長來校,杜仍任院長,但一年餘之相處,傅氏大刀闊斧改革附設醫院積弊,成效顯著。同時,開始注意醫學院院務,是光復以來真正深入了解醫學院之第一位校長。文中所論,實傅氏直接觀察下之結果。茲分析如下:

<sup>97 39</sup>年11月25日,〈戌有校秘11688號函〉,《臺大發文歸檔簿》,第12冊。

<sup>98 《</sup>杜聰明回憶錄》,第七章第六節,〈第二次歐美醫學教育考察旅行之印象〉,頁205。 99 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頁220。

首節言杜氏治下醫學院的癥結在「不能層層負責,結果乃無人負責」。所舉二例,前例之蕭××爲莊校長初任時之總務處出納組主任,<sup>100</sup>卅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隨楊景山總務長去職,《校刊》載其「辭職照准」,<sup>101</sup>不想又爲杜聰明調往醫學院服務。表現不佳,或不稱職人員,杜氏每加迴護,此二例已可說明。而第五節所言,杜氏擬聘年已五十六歲,亦無法醫經驗者爲法醫學助教等事,<sup>102</sup>亦可見杜氏用人之一斑。

其次,杜氏向持「研究第一,樂學至上」信條,每以臺北帝大之研究機制 傲人,而疵議中國大學之不重研究。<sup>103</sup>但杜氏治下之醫學院何以研究室「無人 者多,有人者少」、「桌上塵土堆積,欲覓一人以找不到爲經常」,往昔帝大 之研究風氣與敬業精神是否真正傳承,值得思考。

其三,杜氏任院長,何以「不能有比較多的時間用於行政」,是兼職太多? 還是升任院長後重研究、輕行政?或是漸失敬業之精神?均值得吾人探索。

其四,傅氏以「積年以來不以辦好爲目的,而以見好于各方面之人爲目的」 總結他觀察杜氏之爲人風格,如深刻了解杜氏「機警」之性格,實爲最貼切之 考語。傅氏對杜氏之不滿直陳於杜氏之前毫不隱諱,最可見傅氏待人處事之態 度。

總之,由此函可充分看出傅校長對杜聰明院長不滿之主因,實爲不具行政領導能力等之不稱職表現。魏火曜所言杜氏與臺大當局之衝突、日本醫學與歐美醫學之爭等等,實爲次要因素。錢思亮校長在四十二年七月改聘魏火曜爲醫學院院長,取代杜聰明氏,其主因實在於推動院務改革遇阻所致。

# 七、結論

本文以光復後負臺大重任之數位外省籍校長爲主軸,分別論述彼等與兩位 臺籍學界重鎮林茂生、杜聰明間之相處關係。企圖呈現彼此間由最初之合作無 間、全然信任到之後的產生衝突、暗潮洶湧,甚至出現悲劇的過程。本文名此 項衝突爲「省籍衝突」,然探索其真象後,難以盡謂衝突全來自分袂五十年後 的省籍差異。以初期兩位校長來說,二人皆爲留日帝大出身學者,與臺籍精英 背景相同,從校園內之學術、教育事務而言,難言有嚴重差異之可能。其間衝

<sup>100 《</sup>臺大校刊》16 期 (37.6),3 版,〈新人事〉。

<sup>101 《</sup>臺大校刊》20期(37.12),3版,〈新人事〉。

<sup>102</sup> 此事魏火曜亦嘗提及。見《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51。

<sup>103</sup> 見《杜聰明回憶錄》,頁 190。

突除與政治勢力介入有關外,與學者之自我認知與處世風格亦有密切關係。後 二任校長雖爲留學歐美之學者,但均係學術地位崇高之士,政治勢力在傅校長 任內已無由介入校園,則杜聰明與傅斯年之衝突,應從其他方面尋之。三十九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傅氏致杜聰明之長函,似已將實情呈現。

臺灣光復初期,分袂弟兄間再度重處的過程,以釀成二二八之悲劇最爲不幸,彼時社會中堅知識分子之相處過程,實爲可貴之教訓,本文著眼於此,實欲探索真象,以垂戒於後世耳。

\*本文初稿曾在二○○六年五月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之「第二屆文化交流史:跨文化的互動、衝突與融合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承吳文星教授評論,許雪姬、林桶法等教授惠賜修改意見。又承《臺大文史哲學報》兩位審查人斧削指正,均此致謝。

# 引用書目

#### 一、史料

《人民導報》,1946.3.22-1946.9.13,報載各文。

---.4月8日,來論,邱山水,〈臺大附屬醫院罷診問題〉。

《民報》,1946.3.22-1946.12.31,報載各文。

- ---.3月26日,2版,〈第二病院亦罷業,臺大風潮不能解決〉。
- ---.4月2日,2版,〈醫大學生開大會,要求大學當局反省〉、〈基礎學教室職員亦提出決議書〉。
- ---.4月11日,2版,〈臺大附屬醫院今起復診,應予學術自由研究,羅校長歸臺 急速解決〉。
- ---.8月3日,頭版社論,〈怎樣會感情隔閡?〉。
- ---.9月6日, 晨刊頭版社論, 〈停止公署的原子彈〉。
- ---.9月6日,晚刊,民意機關欄,署名「正義子」,〈擁護停止公權辦法〉。
- ---.9月30日,頭版社論,〈對臺灣大學的期待〉。
- ---.10月26日,頭版社論,〈祖國的懷抱〉。
- ---.10月28日,頭版社論,〈要豫防年底的危機〉。
- ---.12月31日,頭版社論,〈一年間的回顧〉。

《臺灣新生報》,1946.3.26-1948.11.11,報載各文。

- ---.1946年3月26日,4版,〈辭令發給校長も承諾濟み―罷診まご經緯〉。
- ---.1946年3月27日,4版,〈杜院長の斡旋も空し,罷診事件ますく紛糾〉。
- ---.1946年4月11日,4版,〈大學民主化に全力,罷診事件圓滿解決す〉。 《公論報》,1948.7.20-1948.11.11,報載各文。
- ---.1948年8月12日, 社論, 〈愛護臺大, 整頓臺大〉。

國立臺灣大學,《臺大校刊》12、16、19、20、21、23等期。

- ---.12期(37.4.16),2版,〈杜聰明教授返校〉。
- ---.16期(37.6.16),3版,〈新人事〉。
- ---.20期(37.12.5),3版,〈人事動態〉。

- ---.21期(37.12.20),2版,〈莊校長晉京,杜院長代理校務〉。
- ---.23期 (38.1.20) , 3版 , 〈杜院長維持校務 , 勞苦功高 , 全校均表欽佩 〉

國立臺灣大學校史資料室、《校務行政會議記錄》,原件。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文書組檔案股,《臺大發文歸檔簿》。

- ---.第11冊,39年10月2日,〈酉冬醫秘375號函〉。
- ---.第12冊,39年11月25日,〈戌有校秘11688號函〉。

傅斯年、《傅斯年檔案》、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 ---.〈莊長恭致傅斯年函〉(37.12.15),《傅斯年檔案》,Ⅲ:358。
- ---.〈羅宗洛致傅斯年函〉(37.12.19),《傅斯年檔案》,Ⅲ:1337。
- ---.〈羅宗洛致傅斯年函〉(37.12.22),《傅斯年檔案》,**Ⅲ**:468。
- ---. 〈 芮逸夫致傅斯年函 〉 (37.12.20) , 《傅斯年檔案》, No.94-2。
- ---.〈芮逸夫致傅斯年函〉(37.12.24),《傅斯年檔案》, No.94-1。

杜聰明,《杜聰明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

林茂生,〈本島青年に寄す〉,《新建設》3卷6號,1944。

陳儀,〈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92。

楊亮功,〈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楊亮功先生年譜》(蔣永敬、李雲漢、許師慎編),臺北:聯經,1988。

魏火曜,《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

羅宗洛,《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未署年月,影印本。

〈林茂生〉,《臺灣人士鑑》,臺南:興南新聞社,1943。

《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錄》第1輯,臺北:中央研究院,1949。

#### 二、中文論著

#### 1. 專書

杜淑純,《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5。

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臺北:玉山社,1996。

黃宗甄,《羅宗洛》,科學巨匠叢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文化書坊,2002。

《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臺北:臺灣大學,2005。

羅宗洛,《羅宗洛回憶錄》,上海: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學研究所,2003。原 連載於《植物生理學通訊》34:4-36.2,1998-2000。

#### 2. 單篇論文

李東華,《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孟真先生在臺大),《臺大歷史學報》20 期,1996,頁129-163。

李東華,〈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1945-50)——羅宗洛接收時期〉,《結網二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頁455-493。

李東華, 〈論陸志鴻校長治學風格與臺大文學院(1946.8-1948.5)〉, 《臺大歷史學報》36期,2005,頁267-315。

李筱峰、〈二二八事件前的文化衝突〉、《思與言》29:4、1991。

周廣周,〈當代師表陸志鴻教授〉,《中國一週》336期,1956。

翁廷俊、〈盤古開天〉、《楓城四十年》、臺北:臺大醫學院、1985。

陳君愷, 〈同文化與異文化的交會點——「光復」與臺灣醫生患者間醫療關係的一個轉折〉, 《臺灣風物》49:1,1999。

謝承裕,〈陸志鴻先生傳記〉(1993),影印本。

#### 三、英文論著

Wang, Fan-san (王汎森),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0.

# The Dispute between Mainland Presidents and Native Intellectuals at NTU in the Early Retrocession Period (1945-50)

# Lee, Tong-hwa\* Abstract

When the Japanese surrendered in 1945, China recovered its lost land—Taiwan—from Japan. Unfortunately, some serious conflicts resulted from this between mainlanders and Taiwan nativ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putes between mainland presidents and Taiwanese intellectual figures at NTU.

The university has had four mainland presidents: Lo Song-lo (羅宗洛), Lu Chih-houng (陸志鴻), Zuang Chang-Kong (莊長恭) and Fu Ssu-nien (傅斯年). Lo took over the university right after the retrocession and initiated reforms. He retained some local faculty members from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of which Tu Chung-ming (杜聰明) was the most famous (Professor Tu was appointed dean of the Medical School). Lo also invited many outstanding local intellectual leaders to work at the new university, the most notable being Professor Lin Mou-sheng (林茂生), who was made a member of the succession team and bo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heading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hen on, Tu and Lin supported the various mainland presidents in their efforts to build up the new university. Gradually, however, disputes arose between the various mainland university presidents and the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February 28<sup>th</sup> Incident, Professor Lin was arrested and was soon to be killed and Professor Tu resigned from his post.

Why wa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se mainland presidents and the local intellectuals unable to endure?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Keywords:** Lo Song-lo, Lu Chih-houng, Zuang Chang-Kong, Fu Ssu-nien, Tu Chung-ming, Lin Mou-she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sup>\*</sup>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